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文库

舒新城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 舒新城是著名教育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史家，坐能言，起能行，阅历丰富。他这一段经历，是传统与现代之交时刻教育变革的反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与时代关系的反映。

——雷 颐

上架建议：教育学

ISBN 978-7-212-10284-5



9 787212 102845 >

定价：38.00元



文库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舒新城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 舒新城著. —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212-10284-5

I. ①近… II. ①舒… III. ①教育思想 - 思想史 - 中国 - 近代 IV. ①G40-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0630号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JINDAI ZHONGGUO JIAOYU SIXIANG SHI

舒新城 著

出版人：徐 敏

责任印制：董 亮

责任编辑：任 济 王大丽

特约编辑：鲍鹏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印 制：河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710mm × 960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34千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10284-5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兰台学术文库”编者按

中国学术，昉自伏羲画卦，至周公制礼作乐而规模始备。其后，王官失守，孔子删述六经，创为私学，是为诸子百家之始。《庄子》曰：“道术将为天下裂。”孔子歿后，儒分为八；墨子歿后，墨分为三。诸子周游天下，游说诸侯，皆以起衰救弊、发明学术为务，各国亦以奖励学术、招徕人才为务，遂有田齐稷下学宫之设。商鞅变法，诗书燔而法令明；始皇一统，儒士坑而黔首愚，当此之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先王之学，不绝如缕。至汉高以匹夫起自草泽，诛暴秦，解倒悬，中国学术始获一线生机。其后，汉惠废挟书之律，民间藏书重见天日。孝武之世，董子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策，定六经于一尊。其后，虽有今古之分、儒释之争、汉宋之异、道学心学之别、义理考据之殊，而六经独尊之势，未曾移也。

及鸦片战起，国门洞开，欧风美雨，遍于中夏，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此之时，国人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思有以自强；又羨于西人之政教修明，思有以自效。于是有“变法守旧之争”“革命改良之争”“排满保皇之争”，而我国固有之学术传统，亦因之而起变化。清季罢科举而六经独尊之势蹙，蔡子民废读经而六经独尊之势丧。当此之时，立论有疑古、信古、释古之别，学派有“古史辩”与“学衡”之争，学说有“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字革命”“伦理革命”诸说，师法有“师俄”“师日”“师西”之分，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百家争鸣，复见于近代。

民国诸家，为阐明道术、解救时弊，著书立说、授课讲学，其学术思想，历久弥新，至今熠熠生辉，予人启迪。然近人著作，汗牛充栋，多如恒河之沙，使人难免望书兴叹，不知从何下手，穷其一生，亦难以卒读。因此之故，我社特精选最具代表性之近人著作 62 种，分为 6 辑，依次出版，俾读者略窥学术门墙，得进学之阶。此次选辑出版，虽未能穷尽近人学术之精品，难免有遗珠之憾；然能示人以门径，使人借此以知近人学术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密，亦不失我社编辑出版“大家学术文库”之初衷。

此次出版，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提升丛书品质，我社特对所选书籍做了必要之编辑加工。总体说来，约有如下诸端：

- 一、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
- 二、核查各书引文，改讹正误；
- 三、规范各书之标点符号用法，为一些书加新式标点；
- 四、校改原稿印刷产生之错字、别字、衍字、脱字；
- 五、凡遇同一书稿中同一人名有两种及以上不同写法者，一律统改为常用写法。

除以上所举五点之外，其余一仍其旧，力求完整保持各书原貌。

然限于编者之有限学力，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

戊戌仲夏上浣，鲍鹏紫序于丰台晓月里

序

本书是我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史副产物之二——第一种是《近代中国留学史》。

我初不想著此书。十六年一月某日，赵叔愚君介绍某君来谈中国近代教育史问题，来意固在研究教育政策，将有大欲于中国教育改造者；但谈数小时，而所问的都是些极不相干的琐细事情，始终不曾注意到现在中国教育所以如此的历史，更不曾注意到所以构成此历史的原因。他去后，我思所以助之者累日，结果遂费两个月的时日写成此书。

此书并无何种创见，不过将中国教育上 60 年的往事为回忆式的思考，而寻出若干支配的动力而已。但是，在现在，我还相信，对于教育政治家，或“中国教育”研究者，尚不无裨益。

此书成后，我自己对于改革中国现教育的意见亦因而较为确定。这种意见曾在本书末章略为提及，更将在《中国教育建设》、《近代中国教育史》两书中详述：虽然不一定被人赞许，但结论系从经济制度、历史背景中研求而出，自信尚可受时间的洗涤，更望读者不吝赐教，共同努力于“中国的”新教育之建设。

我做此叙时，赵叔愚君已逝两周月：此书得其提示而成，他独不及阅读而死，人生之无常如此。追忆故人，感慨万端，谨在此誌悼！

舒新城

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杭州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二章 鸟 瞰.....	007
第三章 方言教育思想.....	012
第四章 军备教育思想.....	022
第五章 西学教育思想.....	030
第六章 西艺教育思想.....	046
第七章 西政教育思想.....	055
第八章 军国民教育思想与军事教育思想.....	065
第九章 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	077
第十章 美感教育思想.....	089
第十一章 大同教育思想.....	106
第十二章 职业教育思想.....	114
第十三章 民治教育思想.....	131

第十四章 独立教育思想.....	144
第十五章 科学教育思想.....	156
第十六章 非宗教教育思想.....	169
第十七章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	181
第十八章 公民教育思想.....	195
第十九章 党化教育思想.....	206
第二十章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	218
第二十一章 结 论	
—— 60年来中国教育思想总评及今后的途径.....	240
参考书目.....	247

第一章

导 论

1. 思想与思想史

思想原是人类心意中的一种觉识作用，这种作用虽然为人所同具，但因所觉识的对象或觉识的主体不同，其结果常不一致，甚至于互成反比。例如张三生于富贵之家，物质生活上根本不生问题，对于贫民底疾苦也许因同情而有所感觉，但与原来贫苦的李四比较，所感的程度便大不相同；倘若张三先贫而后富或先富而后贫，他对于现在贫民疾苦的感觉也不一样；又如张三一生不曾遇困苦的事情，李四所过的生活无时不与贫穷奋斗，因平日各人所接触的对象之不同，也许张三认为苦痛的事而李四却以为是最愉快的。换句话说，一切人都能思想，但所思想的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思想既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严格讲来，宇宙间绝无同一的思想。但因为思想为“人”所同具，而“人”有人的共相，故在不同的思想中亦可求出其共相。此共相或以人分，或以地域分，或以时代分；若以某人某地或某时代的思想为研究的对象，则称之为某人某地或某时代的思想研究；如将其思想变迁之线索联络而研究之，则称为某人某地或某时代的思想史。故思想史最简单的定义是对于某种思想的进程为连贯的记述。

思想虽然为人所同具，但它是内在的，无论何人对于他人底思

想都不能直接考察；而且它底本质又是极自由的，不论外部的压力如何，都可在人底心意之中自由往来。要对于这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思想为系统的研究，似乎在事实上为不可能。然而一切思想都有其对象的实体，哲学上虽然也有纯粹思想（pure thought）的名词，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若要追问内容，这名词便不能存在：因为无论何种思想，无不有其所以构成的物质元素。这些元素虽然有属于自然界的，有属于人事界的，但都是实在的而不是虚玄的，所以思想底本体我们虽无从直接考验，但由其构成的元素上却可以推知它底功能。

心理学者常谓思想为行为之母，无论何种思想都可以发生行为，而一切行为也都有思想在背后支配着。我们对于他人底思想，虽无从直接体验；但由其行为上的种种表现，却可以推证其思想的趋向。行为之直接可以供我们研究的，有当时的各种活动，其间接之可以供我们研究的，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遗物与种种记载；若能把这些东西加以分析综合的研究，便可发现各时代或各个人底思想进程，便可成为各时代或各个人底思想史。

可是思想史底重要决不在此：倘若只就各种行为中推证出各个孤立的思想或某个思想底连续关系，其结果不过是些流水账簿，和分类账簿而已，在人类社会的总账上不发生何种关系。思想史之所以重要是在它的本质是一种决算，使人由此决算可以进行制定未来的预算。换句话说，思想史之研究，第一要注意思想所以产生之原由；第二要注意它在实际上所发生的效果。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须受因果律底支配，一种思想的产生也自然有它底原因。此种原因分析起来虽然很复杂，但有一条通则可应用于说明一切思想之由来，就是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因之各人因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一人又因先后所处环境有差异，亦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想史底材料虽然是集合各个人底思想而成的，但一切人底思想却未必一一可以作思想史底材料。因为思想史底功用在于说明各种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若是某人底思想与社会生活完全不生关系，便不能让其拦入。譬如说，王甲看得他所畜的母牛生了犊，

想另外弄得嫩草来给犊吃，这也是一种应付环境的思想，然而它底影响最多也只能使他家底犊好好长成罢了，与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样的思想，思想史家是不采取的；倘若王甲底母牛是在严冬产犊，那时积雪几尺，一切草木都已冻僵了，他却因为母牛产犊而想出一种制造嫩草的方法，使社会上畜牧的人都能自由制造嫩草，增加畜产，他这思想却是畜牧思想史中一件最重要的材料。换句话说：各种思想之可否为构成思想史的材料，就看他对于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如何。以这样的眼光去治思想史，自然不免要受“功利之见”的讥讽，然而人事界的一切活动又有什么能超越于“功利之见”以上的。而且一种思想不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根据，就是能产生，对于社会上也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它也因而不能存在，我们就要去研究也无从研究起。所以思想史的材料不仅要有选择，并且不当离开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更简单说：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从各时代底社会活动中求因果，不当专在思想本身上讨生活。

2. 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实际

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应付环境，故其本质可视为一种工具，教育思想也就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一切思想都不能离开实际活动而独立，故凡可以当得起教育思想的名称的，它在教育实际上必定已经或将来必要发生效果。因而我们研究教育思想必得注意于教育实际的各种事象。

论历史，教育活动是与人类共悠久的，论范围也是“无远弗届”的，然而它绝不能离他种社会活动而独立自存。而且因为它底历史悠久与范围广大，对于其他各种社会活动底影响也特别受得大：第一，是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太密切；第二，社会风习对于它的拘束力太大；第三，它不能反抗时代思潮。从理论上讲，人是富有政治活动的动物，一切事业都不能不受现实政治的支配，然而 20 世纪的时代，除去少数的国家经营极少数的大企业外，其余的事业都可由人民自由经营，教育则一律由国家直接经营之、管理之——尤其是义务教

育。故立宪政治的教育异于君主专制的教育，苏维埃政制的教育亦异于其他各种政制的教育，就是一国之中，甲党执政必得贯彻该党底教育政策，而有甲党的教育，乙党执政亦复如之，于是教育设施便不能随执政者底意见随时更改。民国十六年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完全立于两极端，然而中华民国的人民，却不能不因所处的地方之不同而受两端的教育——但两方的实业社会决不闻要立即改组——就是最显著的实例。其次，教育是一种最普遍最平常的事业，无论什么人都得受教育，无论什么人也都可以干预教育事业；而一般民众底习惯都是好逸恶劳，惮于改革；所以各种改革必在其他方面树有坚强的基础、深厚的势力，逼迫着教育不能不改弦更张时，教育是不轻易改革的。我国清末之改行新教育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是教育界的自动，实则当时的外交内政四处都碰着此路不通的钉子，非变法无以图存，教育不过在此种“不得已”的情境之下偶然被动而已。可是教育制度改革之后，人民思想不能跟着走，它又不能如政治般用强力督促着人民跟着走，所以兴学数十年，形式上什么东西都模仿着欧美、日本，而科举思想仍然潜藏在一般人底骨子里，以阻碍教育的进步。第三，教育底本身是温和的改良的，无论何时都得顾及一般民众底现实利益，尊重一般民众底习惯，不使改良的进程发生障碍。所谓“因势利导”、“潜移默化”，都是形容教育功能的良好字面，也就是教育不能革命的见证。所以，某种时代潮流发生之后，文学美术可以独立反抗，教育便只有望风而靡。这样看来，一切教育活动其性质都是被动的；倘若只在教育的现象中追求教育问题，必失之狭隘、偏私而不能有真切综括的结论。故研究教育思想史，固然要注意教育实际上的种种问题，而研究教育上的实际问题，又得注意各问题所以产生的他种社会现象。换言之，我们研究教育思想史，第一要知变，第二要明因。这就是说，各种教育思想都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工具。某时代有某种教育思想是那时社会上的种种需要——原因——有以构成之，而此种思想在实际上是否发生效果，其效果的大小若何，又各受其环境底种种限制，故同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中国与在日本的结果完全不同，就是由于环境有差异。因之我们更可以说：教育思想虽然是

应付环境的工具，但都是一种临时的假定，它诚然可以解决当前的许多问题，然而绝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法则，我们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在根据历史的事实，求得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沿革变迁的线索与所以变化的原因，从其中抽出若干公例来作应付现时及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

3. 本书底范围及目的

教育的历史既是与人类共悠久，则一切人类史中均有教育思想史。中国是四千余年的古国，教育制度之有史册可考者，自虞夏而后已数千年。倘若我们从二十四史中寻出其教育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便可成一部中国教育思想史；这样的工作在现在还没有人做的时候，自然是值得干的，我现在不做这样的工作，第一，是由于力有不逮；第二，是由它的需要不及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迫切。

此处所谓“近代”，时间断自清同治元年至今。何以将近代中国教育断自同治初元？是因为那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若仅就其事迹的本身讲，同文馆的设立，不过教育上一种寻常的举动，并无何种重大的价值。但自此而后，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传衍而来的教育制度，逐渐为西洋的教育制度所替代，而社会上的传统思想亦逐渐破坏无余。倘若我们把同文馆设立以后 60 年之教育事象与其未设立以前 60 年的相较，不仅在形式上截然两途，即内容上亦完全不同。换言之，同治元年之创设京师同文馆是我国教育制度因外力逼迫而逐渐破坏之始，也是中国逐渐将固有的农业社会的教育制度变而采用西洋的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之始。故近代的时间即以斯年为断。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何以比古代的重要？第一，因为时间近，现在的教育进行，易于取法资戒；第二，因为自同文馆设立而后，所有各种教育制度的采用与更张，均为偶然的议论所左右，倡者和者均无确切的见解，非从历史的实证中建立明确的方案，无以祛这朝三暮四的习惯；第三，因为 60 年来的教育思想虽无重心，但每种思想都能使社会上发生影响，使社会上感觉不安，非从史实上寻求因

果详为论列，则中国教育将永为混乱无系统的思想所搅扰，而得不着一个正果；第四，因为中国改行新教育制度的方法完全为移植的——即将他国教育制照本宣科地移过来——在各国教育史很少前例，但在中国行之已数十年，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仍不失为教育改革的一种手段，则此问题的研究且可以其结论供普通教育史的参考。

中国 60 年的新教育，真可谓在昏天黑地的沙漠中“走道儿”，虽然费了若干人力、若干金钱，切实地在那里求出路，但至今还没有找着一条坦荡的康庄。我们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虽然有探讨“光明之路”的希冀，然而不敢必此希冀实现：因为教育思想史中所含的问题太复杂，非“绵力”所能一一理得清楚；就是能理得清楚，教育不是一种独立社会活动，一切都须受他种社会活动底限制，纵有尽善尽美的方案，也不是教育本身所能实现。所以我们底目的：

（1）想用历史的进化的观念，证明种种教育思想，都是当时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假设，并不是天经地义，人人可以创造，并不一定要抄袭外国的。

（2）想用客观的事实证明教育思想是由于教育实际产生出来的，社会上的实际情境是思想的源泉，研究思想史不可丢开事实空为玄谈。

（3）想从历史的实证中求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因果，供给一点创造中国新（适宜之意）教育的资料。

（4）想从历史上寻求实证来证明教育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常常受制于他种现象，使教育者于教育之外努力改造社会。

这些目的虽然是卑之无甚高论，但作者还不敢必其能到——因为缺少史家底才学识三要素——不过悬之为的，努力前进而已。

第二章

鸟 瞰

4. 近代中国教育的背景

倘若中国在 80 年前没有一场鸦片战争，就是和外国人通商，我想最多也不过在国际上做些公平交易而已。中国底社会现象绝不会像现在，更说不到新式教育；又若中国在鸦片战争而后，国势便振兴起来而列为世界强国之一，中日之战不被日本打败，或义和团真能把“洋人”杀退，我想现在的中国教育制度一定还是遵行千余年流传下来的科举制和书院制，也许世界上的某国慕中国教育制度之优良而毅然采用之。

我这议论或许有人以为太重视国际势力而漠视教育制度本身的价值了。实在一切制度之构成都不能离开环境的驱策，而中国新教育制度之采用，更完全为外力所逼成。中国旧日的科举制与书院制，其方法诚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制度的本身却不至于坏到不能存在。（后详）然而清光绪二十八年张百熙奏订学堂章程时竟一笔勾销，而完全将西洋工业社会的教育制度移植过来，其根本原因可以“势迫处此”四字包括之。

中国自昔以华夏自居，对他国则夷狄禽兽之，故历史上虽有他族入主华夏，但中国的文化却不与之同化。鸦片战争以前虽亦曾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诸国通商，但彼此除贸易上之关系外，文化上绝

无接触；欧洲各国亦以中国为地大物博、立国最古的国家，平日无缘深入内地探知内情，亦不知中国究为何物而不敢轻视。及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率骤进，势不得不向国外觅广大商场，于是中国为英人所特别注意。1792 年英政府以通商问题遣使奉聘，清廷虽然待以使者之礼，但不过怀柔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已，对于英政府所希望解决的通商问题则完全置之不理，其使馆亦于翌年禁止设立。他如法、美、葡、西各国虽亦曾通商遣使，但其结果与英国等。盖此时国人对于外国文物制度的观念，一秉历史上轻视蛮夷的习惯而视为不值一顾，所以遇事不加审虑而自由处理之。然而英人内因工业发达的要求，外因东印度会社底成功，终不因形式上之受挫而放弃其东方商场的经营，于是 1838 年（道光十八年）竟因鸦片烟售卖问题而以兵戎相见，中国复不幸而战败，并于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开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上海五处为商埠，偿军费 2100 万两。自此而后，国人轻视蛮夷的观念虽然不曾尽变，但对于西人底坚甲利兵已有相当的认识。此后平定太平军时曾借重于外兵，执政者对于欧西底军备更多一层认识。及经英法联军、中日战争与义和团事变诸役而后，割地赔款而外，乃至皇帝蒙尘，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仅有之奇创。其时国人一面深感欧西各国军备之可畏，一面极力图谋自强；加以日本变法而强的种种事实，又日日诏示于前，于是明达者知各国称霸中原绝不只有军事，军事而外另有其立国要件，乃取法日本而将国内一切政制彻底予以改革，中国的新教育制度也于此大改革之中而由日本输入。总括说来，中国新教育制度是由逼于外力的一种反动所产生的。虽然此种反动是以“图强”为主要元素，但当时之改行新教育制度而将旧的——书院制、私塾制、考试制——一笔勾销，并不是主持者真正明白新教育制度底优点与洞悉旧者底缺点（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革教育论者，并无一人对于旧院制等有详密的攻击或批评），不过眼见得外力日逼，国势日弱，特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推证而极力模仿其种种设施。所以教育改制数十年，形式方面力求欧化，实质则仍保持科举思想、封建思想于不敝。一切教育思想也脱不了此种圈套。